



王
小
波
作
品
集

时代文艺出版社

王小波作品集

作者:王小波

责任编辑:姜淑华

责任校对:岳 邵

装帧设计:易柳洋

出版: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124号 邮编:130021)

发行:时代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印刷:吉林省新华印刷厂

开本:850×1168毫米 32开

字数:450千字

印张:18

版次:1998年9月第1版

印次:1998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书号:ISBN 7—5387—1289—5/I·1246

定价:26.80元

内 容 介 绍

王小波是唯一一位两次荣获台湾联合报系文学中篇小说大奖(第十三届和第十六届)的中国大陆作家。他唯一的一部电影剧本《东宫·西宫》也曾荣获阿根廷国际电影节最佳编剧奖,并荣膺1997年戛纳国际电影节入围作品,使王小波成为在国际电影节中为中国拿到最佳编剧奖的第一人。

然而在一九九七年初,王小波却在他的创作高峰期猝然辞世,他的去世给中国文坛造成的损失终将被我们的后代所指认,他那尚待展开的更宽广的创作领域从此成为令人神往的千古迷踪!

王小波的过人之处,在于他用汪洋恣肆的手法描写男欢女爱,言说爱情的惊人美丽和势不可挡的力量,展示出超拔卓绝的价值境界。其作品通过描写权力对创造欲望和人性需求的压制和扭曲,深刻地揭示了历史的荒诞性,寄寓了对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索而悲悯。

这本作品集收录的都是王小波最具特色的作品,书里的部分作品曾经一度在众多高校学生手里以电脑打印稿流传,那洋溢叛逆的精神,诡秘复杂的叙事,惊世骇俗的奇思,将读者灵魂引向一个已经远逝或永不到的妙趣盎然的想象世界。这正如王小波本人所言:“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

王小波

作品集

时代文艺出版社

目 录

- 王小波笔下的性 李银河(1)
——常态与变态
- 革命时期的爱情 (11)
- 黄金时代(荣获台湾联合报第十三届中篇小说大奖) (143)
- 三十而立 (186)
- 似水流年 (237)
- 未来世界(荣获台湾联合报第十六届中篇小说大奖) (300)
 上篇:我的舅舅 (300)
 下篇:我自己 (350)
- 黑铁时代 (394)
- 变形记 (405)
- 舅舅情人 (412)
- 绿毛水怪 (438)
- 似水柔情 (471)
- 东宫·西宫(电影剧本)(荣获阿根廷国际电影节最佳编剧奖) ...
..... (506)

王小波笔下的性

——常态与变态

(代前言)

李银河

在王小波的文学作品中,性占有重要的地位。他笔下的性极具个人特色,与中国传统小说中那种毫无美感的白描写法十分不同。在他笔下,既有常态的性,又有变态的性。在对常态的性的叙述上,性是自然的,干净的,就如生活本身;性又是反抗的,具有颠覆性,在压抑的环境中像一阵自由奔放的劲风。在他对变态的性的叙述中,性有时是隐喻的,影射现实中的权力关系——在这一点上它进入了福柯关于权力的论域。

常态的性

看王小波小说所写的性,对国人长期以来被扭曲的心态有矫正作用。无论是对性变得冷漠、以无性为品质高尚的人,还是热衷于性却对它持有一种鬼鬼祟祟的态度,以为自己在干坏事的人,王小波笔下的性都是解毒剂。他对性的描写显得极其自然、干净。

在《黄金时代》的开始处有这样一段描写男主人公王二过21岁生日时的情形:“我睡去时,身上盖了几片芭蕉叶子,醒来时身上已经一无所有(叶子可能被牛吃了)。亚热带旱季的阳光把我晒得浑身赤红,痛痒难当,我的小和尚直翘翘地指向天空,尺寸空前,这就是我过生日时的情形。”在讲到队长想将知青“锤骗”时,作者写道:“按他的逻辑,我身上这个通红通红,直不楞登,长约一尺的东西就是罪恶的化身。当然,我对此有不同的意见。在我看来,这东西无比重要,就如我之存在本身。”这种叙事风格显示出一种义正辞严的力量。在我看来,这就像是一个宣言,它公然宣布:性不必躲躲藏藏,性不必鬼鬼祟祟,性就是存在本身,人并不需要为它感

动羞愧。这是对某个时期弥漫于整个社会的禁欲主义气氛和假道学的虚伪气氛的尖刻讽刺。

王小波对性的这种看法在下面这段话中也可以看得很清楚：“在我看来，春天里一棵小草生长，它没有什么目的。风起时一匹公马发情，它也没有什么目的。草长马发情，绝非表演给什么人看的，这就是存在本身。”在作者看来，人的性欲与动植物的自然生命力没有区别。它就是存在之本身。

王小波善于将性摆在一个用平常心来看待的位置上。例如他描写知青王二想在生日那天与队医陈清杨性交时有这样一段话：“我想和她性交，而且认为她不应该不同意。假如她想借我的身体练开膛，我准让她开；所以我借她身体一用也没什么不可以。”作者把两性间的性交与医生给病人开刀相提并论，这对于那些对性交总要大惊小怪的人是一付解毒剂。将性交比喻为开刀虽然乍一听匪夷所思，甚至有点不伦不类，但却造成了一种奇异的效果——它令人转念一想：是啊，性交不过是一种人类的正常活动，两性人际关系中的一件寻常事，又有什么可特别忌讳的呢？

王小波笔下有不少对于做爱情形的描写，但绝不煽情，而是一种近似白描的写法，使它看上去就像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切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例如这一段：“我和陈清杨做爱时，一只晰蜴从墙缝里爬了进来，走走停停地经过房中间的地面。忽然它受到惊动，飞快地出去，消失在门口的阳光里。这时陈清扬的呻吟就像泛滥的洪水，在屋里漫延。我为此所惊，伏下身不动，可是她说，快，混蛋，还拧我的腿。等我‘快’了以后，阵阵震颤就像从地心传来。”在这一段描写中，对女性性快感的描述逼真，纯净，一点不给人丑恶的联想。它使人感到，性快感是女性的一种能力，同时又是她们的权利。这是她们人生中应有的享受，任何人都不可剥夺。男性既从性交中获取快感，又为女性的快感服务。两者都显得自然，既不带一丝一毫的男性中心主义，也完全不损害男子的阳刚之气。

再进一步剖析王小波笔下的性，我们发现它不仅毫不煽情，而且有时根本不追求美感效果，他的白描手法甚至可以用“残酷”二

字来形容,表现出作者对性的旁观和冷静态度,试读这一段:“做爱时我躺着不动,就像从空中看一条泛滥的河流,到处是河水的白光;她的身体就横跨在这条河上。我的那个东西当时虽小,但足够硬梆,而且是直撅撅的;最后还能像成年人一样射精。到了这种时候,她就舔舔舌头,俯下身来告诉我说:热辣辣的,因为我还能热这一下,所以她还是满意的……”

再看这一段:“用不着睁开眼睛,我就知道来到了清晨;清晨的宁静和午夜不同。有个软软的东西触着我的身体,从喉头到胸膛,一路触下来;我想,这是她的双唇。还有些发丝沙沙地拂着身体的两侧。与此同时,我嗅到她的体味,就如苦涩的荷花;还能感到她在我腹部呼气,好像一团温暖的雾。我虽然喜欢,也感到恐惧,因为再往下的部位生得十分不雅,我害怕她去亲近那里,也许就是因为恐惧,那东西猛地竖起来了。她在上面拍了一下,喝道:讨厌!快起来!我翻身坐了起来,甩着沉重的脑袋,搞不清楚谁讨厌,是我还是它。”

还有这段:“后来我和小孙干那件事时,总是在她的房子里。她的房间比较大,还有一张双人床。点上十五瓦的台灯,屋里虽然暗,但是比白天看得还清楚一点。在干事之前她总要用手捏捏我的那东西,然后就若有所思。我想这个毛病是买菜时挑黄瓜练出来的,她们用手指代替硬度计。我那个东西在这种时候还是满像样子的:又粗又长,而且相当硬梆,在各方面都像根哈瓦那雪茄,但也耐不住指甲掐。由这种体验可以知道黄瓜们对长指甲的女人的看法。我问她在想什么,开头她不肯告诉我,后来又说了以后你不要介意——从你的外表来看,这东西不该是这样子的。我说我外表怎么了?她说你外表相当委靡。”

这种写作风格在王小波的性描写中极为典型。他总是使用最精确、最直白的语汇写性、写性器官,写性活动。如果说艺术追求的是美,科学追求的是真,那么王小波的性语汇总是更偏向于科学而非艺术,这一偏向好像一柄双刃剑,一方面杀向重肉体快乐的煽情的性描写;另一方面也拒绝了重精神美感的艺术的性语言。他

的性语言带有科学的客观、冷静，甚至是一种近似残酷的、切近而今观察对象纤毫必露的冷漠观察。因此，人们透过他的性话语来看性这件事时，与其说是透过一副桃色眼镜，不如说是透过一架显微镜。这种写法据我看是作者为性心态极为扭曲的人们特意配制的一付解毒剂。

看王小波笔下的性描写还可以发现，他特别偏爱在大自然中发生的性。除了《黄金时代》中男女主人公的性绝大多数都发生在野地上、山坡上之外，还有《三十而立》中王二和小转铃的“钻高粱地”；《似水流年》中的李先生和线条在荒庙中的首次性交；《二〇一五》中小舅和小舅妈在劳改地碱场的野地中做爱的情形等等。请看这一段对男女主人公在英国旅游时的描写：“我们钻到林子里去，这里一片浓绿，还充满了白色的雾。我老婆大叫一声：好一片林子呀！咱们坏一坏吧！于是我们就坏了起来。享受一个带有雾气、青草气息和寂静无声的性。”

在我看来，王小波之所对发生在大自然中的性活动情有独钟，首先表现出一种浪漫的气质——枯燥的统计数字可以证明，最大多数的人类性活动都是在室内完成的，但谁也不会埋怨一位诗人对发生在草地上的性的偏爱，并且会对此怀有一种宽容而会心的理解。其次，在自然环境中发生的性由于更接近动物和植物，从而显得像自然现象一样平常和自然。再次，发生在田野中的性带有一种野性之美，它从世俗的、寡欲的、拘谨的、乏味的性活动中飘然而去，成为一种超凡脱俗的美好经验。这也许就是王小波偏爱自然中的性的原因。

王小波还写过一种“无性的性爱”，是《革命时期的爱情》一篇中王二与姓颜色的大学生之间的恋情：“我还能嗅到姓颜色的大学生小腹下面有一种冷飕飕的清香味，但是不好意思到那里去闻。这就像一只没睁开眼睛的小狗闻一块美味的甜点心，但是不敢去吃。对于小狗来说，整个世界充满了禁忌，不知什么时候会被大狗咬一口。”这种无性的性爱比起成年人之间的性，有一种纯真无邪的味道，令人莞尔。

王小波在《革命时期的爱情》中还阐述了革命对性欲的影响：“我是一个男性，满脑子都是人力战，白刃战，冲锋，筑城这样一批概念。虽然和她亲近时也很兴奋，但是心里还是腻腻的，不能为人。就好像得了肝炎不能吃肥肉。革命时期对性欲的影响，正如肝炎对于食欲的影响一样大。”有这样一种说法，如果一个人来到一个陌生的文化里，在最短时间内能最深入地了解该文化的捷径就是看小说。对于“革命”时期的气氛以及性这件事在当时给人的感觉，王小波的表达是独特的。他把人们带回到那个不理智的年代中去，令读者仿佛切实地感受到当时一个情窦初开的男孩的感觉。

在王小波笔下，性不仅是自然的、正常的人类行为，当它存在于一个压抑的环境时，又是反抗的和具有颠覆性的，《黄金时代》中有将性称为“做案”的情节。领导要男女主人公开交持婚外性交的问题：“团领导要人保组的人带话说，枝节问题不要讲得太多，交待下一个案子罢。听了这活，我发了犟驴脾气：妈妈的，这是案子吗？陈清扬开导我说：这世界上有多少人，每天要干多少这种事，又有几个有资格成为案子。”作者在这篇小说中用反讽的语气处理男女主人公交待好情的过程，使之成为对压迫的彻底反叛，其中所蕴含的颠覆性力透纸背。

最令人拍案叫绝的是《黄金时代》一篇中所设置的一个悬念：究竟男女主人公是怎样度过难关的，这也是极其深刻、辛辣的一笔。原来，他们是被逻辑推论导致的绝境所救：“以前她承认过分开双腿，现在又加上，她做这些事是因为她喜欢。做过这事和喜欢这事大不一样。前者该当出斗争差，后者就该五马分尸千刀万剐，但是谁也没权力把我们五马分尸，所以只好把我们放了。”按照那个不理智的年代的逻辑，性是罪恶。然而，如果说性活动是罪恶的，承认喜欢这一罪恶当然要罪加一等，对它的惩罚就要更为严厉。沿着这一逻辑走到极端，就使初始判断的全部荒谬暴露无疑，作者就是这样极其巧妙地实现了对压抑结构的颠覆。

变态的性

如果从社会学角度分析王小波笔下的性，可以从另一侧面看出作者有关性描写的思想渊源。除了写常态的性，他还写了变态的性，例如不以生殖为目的性和带虐恋色彩的性。

在我看来，性思潮中最具革命意义的有两个分离，其一是将性快感与生殖行为分离，这一点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大多数人的实践，就连最看重生育价值的中国人也参力。进这一实践之中，虽然有许多人是迫于计划生育政策而不得不改变了他们对性的观念的——除非他除了生那一两个孩子之外完全禁欲；其二是将性快感与生殖器官分离开来。当今世界中一种最先锋的性思潮是让性活动走出生殖器官的范围，将其扩展到身体的其他部分。社会批判学派在论述这种思潮的意义，女权主义也在讨论这种思潮对于女性的特殊价值。而虐恋的意义之一就在于它使快感与生殖器官相分离，在虐恋活动中，有时甚至可以完全脱离生殖器官，如福柯所说：“它的另一个观念是把身体的所有部分都变成性的工具。”福柯以虐恋活动为证据提出了“快感的非性化”观念，这就使虐恋不再仅仅是少数人追求快感的活动，而具有了开发人的身心领域、创造新的快感形式的意义。

王小波在他的小说中描述和区分了以生殖为目的性和以娱乐为目的的性：“我和陈清扬侧躺在蓝粘土上，那时天色将晚，风也有点凉。躺在一起心平气和，有时轻轻动一下，据说海豚之间有生殖性的和娱乐性的两种搞法，这就是说，海豚也有伟大友谊。我和陈清扬连在一起，好像两只海豚一样。”关于以生殖还是以娱乐为目的，性社会学把它当成人类性活动变迁史中的一个重大转折。在传统的社会中，性的主要目的—一般是生殖；而在现代社会中，性活动中娱乐的比重越来越大。在一个以生育为性目的的社会中，娱乐性的性活动往往得到负面的评价，但是正如马尔库塞所说，现代人对于以生殖为目的性的反抗是一个“伟大的拒绝。”以此观之，王小波笔下的性是现代的性的一个范本。

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思想的一个基调在于批判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蔑视爱欲和摧残人性,揭示出现代工业社会中的人们丧失了完整的美感和爱欲这一事实。马尔库塞主张使整个身体而不仅仅是生殖器官成为性感的主体的目标,所以他不但不反对以娱乐伪性目的,而且赞赏性欲对生殖秩序的抗议,赞赏性欲对保障生殖秩序的制度的抗议。所谓“生殖秩序”是指这样一种观念,即认为正规的性关系应当仅以生殖为目的,否则就是越轨行为。按照生殖秩序的逻辑,避孕的性交、不能生育的异性性交方式和同性性交都是不道德的,按照这种逻辑,那些不知道性交与生殖之间的联系的人(例如一些原始部落民)的性行为就是越轨行为;而那些以为同性性交可以受孕的性行为却不属于越轨行为了。这可真够荒谬的。

在马尔库塞看来,“性反常”本身无视生殖秩序的压抑要求,坚持以快乐为性的目的。性反常者是与现实原则对立的快乐原则的拥护者,因为性反常行为表现为某种不受时间空间和对象选择限制的性活动,表现为不受性器官限制的多形态的性活动。他们对当代文明必然造成的部分丧失性特征的个人构成了威胁。马尔库塞对所谓“性反常行为”加以认可,认为这种行为的基础是受到压抑的人类潜能与自发性的释放。他认为,变态的性活动中包含着革命的潜力,是对生殖秩序的反叛,是一个“伟大的拒绝”,并且更充分地揭示出爱欲的意义,代表了肉体的可能性的充分实现。

王小波笔下的性有时是隐喻的,影射一种权力关系,而最能反映权力关系的性就是虐恋关系中的性,这就是王小波的作品中常常会出现虐恋意象的原因之一。

虐恋竟像最明显地出现在《未来世界》一篇中:关于写作公司的成员月末要受到例行鞭笞惩戒的情节,关于“我”与出版署的女友做虐恋性游戏的情节,都是明显的例子。在王小波未完成的遗作《黑铁时代》中,虐恋更成为一种主要意象,这部书用荒诞夸张的笔法描写了未来时代知识分子的处境他们虽然可以通过电子互联网接收到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信息,即完全生活在一个具有现代

通讯手段的社会当中,但又受到铁笼、镣铐、肉体惩戒的约束。然而,在这个幻想中的黑铁时代,权力并非赤裸裸的暴力,而是带有虐恋色彩的施虐与受虐游戏。

“虐恋”这个词英文为 sadomasochism,有时又简写为 SM、S—M、S、M 或 S&M,这一概念最早是由艾宾(Richard von Krafft—Ebing, 1840—1903)创造的,是他首次将施虐倾向(sadism)与受虐倾向(Masochism)这两个概念引进学术界,使之成为被广泛接受和使用的概念。受虐倾向一词是他用奥地利作家马索克的名字演化而成的,但施虐倾向一词并不是由他首创,而是最早于1836年出现于法国的字典,到19世纪80年代才传播到德国的,我在本文中所采用的“虐恋:”这一译法是我国老一辈社会学家潘光旦先生提出的。这个译法令人击节赞赏,因为它不仅简洁,而且表达出一层特殊含义:这种倾向与人类的恋爱行为有关,而不仅仅是施虐和受虐活动。

虐恋似乎是一个离中国相当遥远的世界,至少在表面上看是这样:中国既没有虐恋者的俱乐部,也没有很多虐恋者去心理医生那里求治。有西方人把这看成是中国的一个特色,他们说:“在中国的色情艺术品中,攻击性或虐恋的形象极其罕见。”然而,中国的文化虽然有其独特性,但中国人与世界上其他人的共同点多于不同点,虐恋绝不是其他文化中特有的现象。

虐恋现象不仅是神秘、有趣的社会现象,而且在当今世界有着越来越重要的意义,可以预言,它在人类生活中所占的分量还会继续加重。这不仅是因为有更多的人参与虐恋活动,如福柯所言,“这种现象是一种比过去更为普遍的实践”,(Foucault, 298)也不仅因为虐恋的形象在大众传媒中出现得越来越频繁,而且因为虐恋作为一种特殊的人类性倾向,对于理解人类的性本质与性活动、对于理解和建立亲密而强烈的人际关系、对于理解社会结构中的权力关系。对于理解一般人性及人的肉体和精神状况,都颇具启发性。

两相情愿的虐恋活动在现代将“原始状态的人”(主人与奴隶)

当作一种性格来看待；将“原始的非理性”（统治与屈从）当作戏剧的脚本来看待；虐恋活动的道具（皮靴、鞭子、锁链、制服）是国家权力的工具，虐恋活动表现了社会权力的原始状态，明显的等级制，差异和权力，非理性，狂欢状态，身体的异化。它表现了社会的逻辑，但是拒绝把这种逻辑视作命定的；它反对将社会权力的管理者视为天然合理合法的，拒绝将权力当作命定的。虐恋活动用权力的象征做游戏，为的就是拒绝其天然的合法性。虐恋活动是对社会压迫和社会危险的模仿性或象征性的演习。由于虐恋是社会矛盾的戏剧形式，它是有意识地反自然的。它并不是违反自然规律的，但却否定自然规律的存在。

虐恋意象之所以引起敏感的作家王小波的关注，又因为它是象征主义的杰作。像戏剧一样，虐恋活动中借用了现实生活中的服装、道具（绳索、铁链、吊索、眼罩）和布景（卧室、厨房、地牢、修道院、监狱、王国等）。许多虐恋者迷恋于制服及其所代表的权威体制，如军队、医院、警察的制服。乍一看，虐恋活动好像是遵从于正统的权力模式的，然而正相反，通过对服装布景的夸张性强调，虐恋活动将社会权力变成了剧本和表演，因此是可以不断改变的，作为一座不断更换剧目的剧场，虐恋活动颠倒和转换了社会的角色，但并没有完全脱离社会的舞台。虐恋是权力关系的游戏化，也是权力关系的暂时化，使之从不可改变的力量变成可以随意改变的东西。正像许多女权主义者所说的那样，虐恋活动不是把权力关系从性活动中扫除出去，而是一种性感化了的统治与服从关系。权力的运用，创造出虐恋活动的性感内容。

根据福柯的研究，惩罚权力的新技术开始于启蒙时期，惩罚的性质从专制君主的个人报复转变成整个社会对犯罪的理性的惩罚。一些人对虐恋的否定态度来自它借用了法律惩罚的模式，同时却重新安置了惩罚的权力，虐恋活动中的惩罚戏剧不是为了防止犯罪，而是为了性的快乐。虐恋活动创造了一座娱乐性的权力关系的剧场，将惩罚的权力从理性的自然法规的产物转变为社会的非理性产物。

福柯强调,虐恋中的统治是为了创造快感,而不是个人或政治的屈从形式。他说:虐恋活动引起他注意的一点,正是它与社会权力的差异。在虐恋中,活动双方的权力差异服从于创造快感的总目标,而不是人屈从于僵硬的权力结构的统治形式。

福柯论述过虐恋中的权力关系问题,他指出:“我发现虐恋现象总的来说比这还令人惊异。在这种活动中,性关系是由一种神秘关系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虐恋不是一种他(或她)受虐和他(或她)施虐的关系,而是一种主人与他对他行使主人权力的人之间的关系。使虐恋实践者感兴趣的是,这种关系既受规则约束又是开放的。它有点像下棋,其中一人赢另一个输。主人在虐恋游戏中会输,如果他不能对他的受害者的需要和磨难作出反应。反之,仆人也输,如果他没能达到或不能达到主人对他的挑战。这种规则与开放性的混合通过引进持续的创新、持续的紧张和持续的不确定性,具有强化性关系的作用,这是一般的活动中所没有的。”

福柯多次提到虐恋权力关系的开放性,这正是虐恋关系的魅力之所在:在现实生活中,权力关系是固定的,不可随意转换的;但是在虐恋活动中,权力关系是开放的,主人可以变成奴隶,奴隶可以变成主人,这对于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尝过权力滋味和权力过多成为重负的人来说,都具有极大吸引力。而且它虽然只是在游戏中颠覆了权力,但对现实中的权力的性质——它们常被标榜为自然的秩序,权力自身当然很愿意相信这一点——也播下了怀疑的种子,如前所述,它对现实中的权力至少是不大尊重,拿它开了个玩笑。而这正是虐恋关系的讽刺力量之所在,也是权力不愿意领受的。通过撕掉权威的面纱,虐恋揭示了我们性文化深层的伪善,从而揭示真相,消解其影响。王小波小说虐恋意象的描绘正是出于这一理论背景。

李银河,女,1952年生。王小波夫人,美国匹兹堡大学社会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著有《中国人的性爱与婚姻》、《生育与中国村落文化》等。

革命时期的爱情

《革命时期的爱情》序

这是一本关于性爱的书。性爱受到了自身力量的推动,但自发地做一件事在有的时候是不许可的,这就使事情变得非常的复杂。举例言之,颐和园在我家北面,假如没有北这个方向的话,我就只好向南走,越过南极和北极,行程四万余公里到达那里。我要说的是:人们的确可以牵强附会地解释一切,包括性爱在内。故而性爱也可以有最不可信的理由。

作者

一九九三年七月十六日

有关这本书:

王二 1993年夏天四十二岁,在一个研究所里做研究工作。在作者的作品里,他有很多同名兄弟。作者本人年轻时也常被人叫作“王二”,所以他也是作者的同名兄弟。和其他王二不同的是,他从来没有插过队,是个身材矮小,身体结实,毛发很重的人。